

共和主義新貌：裴迪特來訪演說記事

劉俊麟.....277

裴迪特提出一種相當新穎的自由觀，他稱之為「自由即非宰制」，以對比於伯林所設想的「自由即非干涉」。

《呼吸鞦韆》的風波

胡昌智.....285

新德國人都是跨文化的人，兩個制度下的人，是雙語言的人。他們看到本土人看不到的現象。這是他們的批判力所在。

思想書評

評胡鞍鋼的《毛澤東與文革》： 兼論毛劉周鄧的思維方式及文革的起源

郝志東.....293

我希望加深對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和鄧小平的理解，從而加深我們對中國和中國革命的了解。

思想人生

夏志清：反思中國文學

李懷宇.....309

《中國現代小說史》成為經典，夏志清頗為得意的是捧四個人：張愛玲、沈從文、錢鍾書、張天翼。在他之前，一般現代文學史對這四個人重視不夠。

致讀者.....323

世界能從台灣學到什麼？*：

郝瑞

何姿瑩，陳瑋鴻譯

——從專制到民主；從奇蹟到焦慮；從中國到世界；從美麗島到垃圾島，又或者可能再度返回……¹

當我受邀擔任北美台灣研究學會的主題演講者時，我便決定聚焦在「台灣的重要性」此一較為廣泛的題目，以及研究臺灣之所以具有的意義；當然，談到台灣研究的重要性，顯然是因為我們能藉此學習到什麼。所以，我決定把我的演講題目稱作「世界能從台灣學到什麼？」

* 此篇文章改寫自本人在北美台灣研究學會(The North American Taiwan Studies Association(NATSA))2006年7月於美國加州聖塔克魯茲舉辦的年會中所發表之主題演講。原本的講稿是針對一群大多是台灣出身、熟諳英文的聽眾而寫，如今幾經增刪，提供給更為廣泛的一般台灣讀者，並且根據自2006年以來的諸多情勢更迭予以修訂。此篇文章為何姿瑩和陳瑋鴻所翻譯，經陳瑋鴻修訂，作者業已檢閱並認可此篇譯稿。

1 Ilha Formosa在此翻譯成美麗島，考量點有二，一是「美麗島」一詞的本土使用脈絡清晰，二則是另外常用的譯名「福爾摩沙」較具觀光色彩，且該詞的歷史脈絡帶有殖民色彩。

事實上，我的確相信這個世界可以從台灣學習到許多全世界各地思想周慮的人們首要關心的議題，例如關於專制和民主、關於繁榮及其不滿的原因、關於民族、族群和階級認同的變化莫測，以及關於環境上的挑戰（畢竟在這個過於狹小的星球上住著太多人了）。同時，由於我認為台灣的前車之鑑是各地的人們都應該要知道的，我也想藉此挑戰台灣的學者們，希望他們²可以將這些議題的訊息一一傳達出去，向全世界說明這座島和它所帶來的啟發——不論正面或負面、激勵人心或提供警告——對世界各地的意義。在此，我想要探討最近25年來台灣的四種轉型，說明這些教訓是什麼，它們又構成了什麼樣的挑戰。這四種轉型即是：從專制到民主、從奇蹟到焦慮、從中國到世界、以及從垃圾島（如果幸運的話）返回，再次當得起「美麗島」（Ilha Formosa）的美名。

一、從專制到民主

在過去20年，台灣第一項重大的轉型，即是從戒嚴時期那井然有序卻殘酷的一黨獨大專制政體，轉型為混亂但卻如同各地其他國家之民主政體一樣保障公民權的政治型態。世界各國可以從這第一項轉型，亦即政治轉型中，學到什麼呢？

第一件可以學到的事情是，這樣一種轉型即使沒有美國的協助，也可能和平地發生。1987-1991年，是整個世界政治體系的關鍵

時刻；這段時間是戰後時期或說冷戰時期的尾端，許多國家皆經歷了大規模的體制變化和重新洗牌。這些政治上的轉型形式不一，就經歷轉變的國家內部的過程而言固然如此，就那些國家與世界強權的關係來說也是一樣。然而，我將指出，台灣的模式是一種內部與外部過程的獨特結合。基於這個理由，我認為台灣的政治轉型是最成功的例子之一。台灣的政治轉型是和平的，並且毫無美國的協助（美國甚至有所抗拒），因而顯得相當特別。如果我們比較台灣和其他國家的轉型，我們就可以明白它為何特殊。

最糟糕的政治轉型，非南斯拉夫和高加索地區莫屬。在那裏，當意識型態上多民族的共產政權退卻時，肆無忌憚的民族主義領導者，挑動原先沈睡中的種族民族主義的情緒，引發了血腥的戰爭。如今巴爾幹半島的戰火似乎停息了，但在高加索地區卻悲劇地持續著。在高加索地區，分離主義運動即使不是美國直接資助，至少也受到了美國的鼓勵，延續過去冷戰政策的一環。而在南邊的斯拉夫地區，直到1990年代末展開干預之前，美國長期袖手旁觀，場面話說了不少，卻僅暗中選邊，實際毫無行動。

稍微好一點的情況，也許是俄羅斯的政治轉型——曾經出現暴力，但範圍有限也有所節制，腐敗和朋黨政治一度成為主流；如今俄國已經演變為半穩定的新威權主義，原本支持該威權政府的美國，雖然憂心忡忡，卻只能無奈地保持合作。

再更好一點的是東歐國家和歐洲的前蘇聯共和國。美國積極鼓勵它們民主化，結果殊異，但大體來說成就了奠基於全民普選的穩定政權，可惜極權主義仍有可能死灰復燃，有時候甚至激發如2004年烏克蘭所發生的群眾革命活動。

在此之列，台灣實在是鶴立雞群，因為它的政治轉型是原先的威權政體自己發動的——雖然我仍不認為任何人知道為什麼蔣經國

2 台灣女性主義者自己做過一次小型而並不具備代表性的投票，多數人認為「他／她們」是they比較好的翻譯，但其中有一位認為直接用「她們」，另一位則認為「他們」即可。這背後的立場位置各不相同，經過考慮，暫且於此使用慣常的「他們」來表達不具性別的they。

在臨終前決定要悔改其列寧主義；因為台灣的轉型沒有暴力事件；也因為先前的威權政體和美國的關係友好，不像俄國、東歐和高加索區處於對立，所以美國不會鼓勵或提倡台灣的民主化。台灣的民主化並非因為美國的關係，而是儘管有個美國，它還是走向了民主。這個世界可以從台灣得知，本土培育的民主化是可以成功的。我認為，民主轉型的過程直到2008年才完成。阿扁的第一次當選，結束了一個列寧式政黨70年以上的統治（儘管到那時一般公認已無列寧式政黨之實）。非常有趣的是，同一年在墨西哥發生了一樣的事，文森福克斯當選總統，也結束了當地革命建制黨的統治。但直到馬英九的當選證明了選票不僅可以將執政黨轉為在野黨，也可以讓在野黨再次重返執政，民主的制度才算確立。

全世界可以從台灣的民主轉型中學到的第二件事是，儘管所有政治經濟學、階級、國際關係等等各方面的理論都不願意用個人來說明歷史事件，但個別的「偉人」（不幸偉人多數仍是男的）其實可以改變歷史。我指的是李登輝。我認為，大家還遠遠沒有認識到，在遠見、手腕和寬恕這些方面，20世紀末的政治人物中間，李登輝堪稱翹楚。可以跟他相提並論的政治領袖，我只想到南非的曼德拉。他們兩人都接管一個原是威權的政府，兩人都出身於當地不具權力、卻為多數主流的族群，兩人皆巧妙地結合了議會立法和幕後的交易，讓原先的統治者挪離權位，在他們退出後並不挾怨報復。兩人也都成立了委員會來調查並紀念各自國家政治壓迫的黑暗往事，並且兩人也都按任期卸任，為繼任者維繫了民主過程以及執政的機會。即使李登輝所領導的是一個腐敗的政權，並且和台灣每個重要的黑道都有連繫——這我猜想他有；即使如培瑞·安德森說的，除了自己，他出賣了每一個人——這些和他所完成的和平轉移相比，都微不足道。畢竟，曼德拉也從沒懺悔過他曾經是個恐怖分子。

這世界可以從台灣轉型到民主的過程學到的第三件事，是民主可以顯得混亂但照舊運作。許多人——大多數是台灣人或中國人——批評台灣的民主不道地。貪污、買票和賄選的情況猖獗，投票的時候，許多人考慮的是候選人給了我什麼特殊照顧，而非思想觀念或自由選擇。立法院裡，各個政黨縱橫捭闔，不講原則，只顧私利（台灣立法院的黨際分野比較像是一團犬牙交錯的模糊線條，而非一條明確的界線），還不忘上演拳打腳踢和豬血噴灑的對抗。這些景觀，令許多台灣的知識分子，或許也包括一些現在正在閱讀此篇文章的讀者，感到相當尷尬和難為情。

然而，我作為一個美國人，在參議院禮節和豆子湯³等古老傳統的表面下，實際觀察美國民主體制的內在運作後，就會發現投票率較台灣來說低得多；在選舉獻金的形式下，賄選買票更加大規模；政見訴求只剩下一個最小公約數：不計顏面的軍事愛國主義；執政黨視需要重劃選區，結果多數議員的席次幾乎不可能翻盤；而當今的反對黨滿腦子想的都是搗蛋與民粹。這時候，我開始為台灣真正的民主喝采，在那裏，人們會走上街頭，百分之七十或八十的人投票，政黨激烈競奪席次，翻盤是常事，政黨之間的合縱連橫以極不可思議的方式進行著。我認為，真實世界中民主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也不過就是如此吧。

我要談的第四項教訓，對象是那些主張文明衝突論、亞洲文化論、或某些版本的儒家文明論的擁護者。必須指出，在台灣演化出來的這套即使不完美、但卻十分道地的民主制度，是出現在亞洲的土壤上，是由一群主要繼承中國文明的人民所鑄造的。李光耀之類的人聲稱，「西方式民主」對東方文化來說一點都不適用；至於中

3 美國眾議院和參議院的附設自助餐廳(cafeteria)皆提供豆子湯。

孩送去美國的研究所念書，當我們發給一名台灣學生入學許可時，入學委員甚至不必擔憂這位學生第一年的經濟資助，即便如此……台灣人仍然焦慮。

就像是在任何社會，確實有某些客觀原因引發經濟的焦慮感。例如全球彈性累積的資本主義是不可預測的，能源價格高居不下，而台灣國內只有少量的能源生產，並且高度依賴中國作為製造業平台、國內產品銷售的市場，以及甚至是——至少在私底下——廉價勞工的來源。又例如競爭乃是永遠都存在的。但是客觀而言，台灣家戶仍然是富裕且穩定，收入的貧富差距也還算低。那麼為什麼仍有經濟上的焦慮呢？對此我並沒有確切的答案，不過我還是想為世界提出一項啟發，那就是：快速的發展、繁榮和巨大的外匯順差都不足以為一個國家帶來經濟上的安全感，特別是如果它長久以來在政治上都懷著不安全感。

第二種病徵則是「無法成為美國」的焦慮感。我從兩個案例的分析展開討論，都是我研究生的報告：一篇是討論台灣的精神科醫生，另一篇處理的是關於烏克蘭新娘。

周仁宇在比較台灣和華盛頓州精神專科醫院的討論中，敘述他首度參訪州西醫院，也就是華盛頓州最大的公立精神科醫院的經驗：

我們前往的單位是州政府社會健康部(DSHS)稱道的「尖端司法精神醫學中心」。它的正式名稱是「司法精神醫學中心」(Center for Forensic Services (CFS))，是一棟在我參訪前幾個月的2002年4月剛完工、有嚴密保全的大樓。然而在參訪行程的尾聲，當導覽人員問我的感想時，我無法告訴他對這趟拜訪的感覺。我大概是讚揚了這棟大樓的設計和園區的美麗，而當我這麼說時我確實是真心的。但當時我無法表達我真正的感覺，

因為那同時交雜著既熟悉又陌生、既清晰又模糊，還或許有點既吃驚又令人欣慰的感受。從我抵達醫學中心的第一刻起，我腦海中不斷浮現台北市立療養院⁴的景象。一些很熟悉卻又隱藏起來的東西被喚醒了。我告訴我自己：「這就是我們(台灣人)一直以來所追求的」

1997年，台灣精神醫學會的培訓委員會發出一份調查，給所有國內精神科住院醫師訓練機構的主任們，要求他們提供一份各自訓練課程必讀的書目。委員會隨後彙整了所有的回覆，並且提出了一份建議閱讀書單。244本的推薦書中，台灣人寫的不到十分之一。此外，那些國內出版的書，大部分是完全自英語編輯翻譯的文章。至於在司法精神醫學(forensic psychiatry)領域裡的七本建議書籍中，有六本是英語教科書。唯一用中文寫的，是一本台大精神科臨床案例報告的合集。

雖然司法精神醫學在台灣尚未真正成為精神醫學和法學共同關注的主題，但這項學科出現時(不是作為一般性的用途，例如開庭作證或性犯罪者，就是特別的案例，比如引發全國關注罪大惡極的虐童案)英語教科書的引導功能，就如同燈塔般指引著精神科醫師抵達港口。這或許有後殖民的因素在作祟，但後殖民的成分何自？是因為用美國的理论強加套用在台灣現實上，還是台灣的現代化使得美國的理论和當前情境息息相關？

換言之，即便是一名深綠、高度專業、快拿到他第二個博士學

4 現更名為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

位、並對美國實際生活有著廣泛經驗和眾多批評的人，仍然會對台灣能否符合美國的標準感到焦慮，而且不論好壞，認定現在的美國就是台灣的未來。

第二個案例中，曾薰慧探討為什麼儘管費用極昂貴且成功率低，一些身份地位向上爬升的台灣男人，仍然試圖從烏克蘭娶回新娘。譬如說，那些從越南娶回新娘的男人，比較害怕台灣的現代女性，而且尋找的是「乖」、勤勞、照顧好婆婆，也不過問太多的太太；但是試圖娶烏克蘭或其他東歐新娘的男人卻不一樣，他們追求的是光彩、階級地位、受尊敬，而如曾薰慧所闡釋的，這些東西常與美國聯想在一起：

然而，烏克蘭新娘的案例，必須考量東西方的動態關係：「白皮膚」在東方是如何廣泛被錯認為「西方化」、「美國化」和「現代化」的象徵。此迷思讓仲介生意在市場上能持續存在，其運作邏輯可概述為：所有烏克蘭人都是金髮白皮膚，而所有白人皆來自美國，美國又是一個現代化的完美典範，而現代化是值得嚮往的，因此烏克蘭女人也值得擁有。在此意識下，被商品化的不是這些白種女人的家務勞動，而是她們的「身為白人」。

很清楚地，對美國的著迷已經瀰漫成一種全國性的焦慮感。美國是如此重要，以致於連批判美國生活方式的台灣人，都得擔心無法與之相比，而男人甚至願意千里迢迢娶回來自像烏克蘭這樣一個遙遠又未知(而且事實上，也相當不像美國)國度的女人，只為了看起來他們有權利擁有可以冠以美國之頭銜的某物或者某人。

還有很多其他的例子，但我認為這對世界的啟發是，文化帝國

主義——無論有意或無意——塑造人們心靈的力量廣泛到了什麼程度，即使是在像台灣這樣一個普遍受有高等教育、高收入、後工業的社會也是如此。羨慕感並不局限在物質層次；在許多方面，台灣的物質生活和美國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其他許多國家的公民嚮往美國，是因為其本國壓迫性的政府非常反美、或者當地社會的確缺乏美國的物質生活條件和公民自由，但是台灣的美國夢，或說是美國焦慮症卻不同，並不是本國的匱乏而起的反應。台灣的情形，促使整個世界好好思考美國文化霸權的真正根源和機制。

第三種也是最普遍的症狀，至少是顯現在知識分子身上，即焦慮於台灣仍然不是一個國族。我還記得2000年總統大選後的那個早晨，我收到一封來自呂欣怡的電子郵件，標題是「阿扁，……哪裡的總統？」：他真的會站在那裏，背後是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牆上掛著國父肖像，樂隊正演奏著「三民……主義……吾黨……所宗」嗎？嗯，是的，實際上，他這樣做了八年。畢竟，除了他個人的理財問題之外，他是個聰明又謹慎的人。他毫無選擇，得跟大家一起玩「猜猜我是誰」的遊戲。但是我猜想，對此他的內心並不太開心，其實大家也都不開心。對於制度的現狀——在這個富足小島上有個運作良好的民主體制——大家都滿意；但是對於意識型態的現狀——國名、國家象徵、護照——大家是一肚子氣。沒有人喜歡這種現狀——藍營、綠營、知識分子、一般百姓，甚至中國共產黨也不喜歡。對於各方來說，或許現狀是所有現實選項中較好的，但這並不能說明什麼，而且結果上，導致的是這片全面發作的國族焦慮症，或許我該的是說，國族不完全的焦慮症。就像所有的焦慮症，它產生了各種悲傷、感人和有時顯得滑稽的故事，在台灣獨一無二。

許瀟文在她的博士論文中寫了一整章討論護照的問題。你抵達機場，他們問你從哪裡來，你說台灣。除非他們聽成「泰國」，否

則他們會查手冊，然後告訴你：「抱歉，沒有台灣這個國家。」「嗯，我的護照上寫的是中華民國(The Republic of China)。」「喔，你是從中國來的。好的。」「呃，不是。真的不是。」到最後你通過海關，但感到有點頭痛，完全不是因為時差的關係。幸運地，許博士找到了她一度放錯地方的護照，所以她得以出席今天的研討會，但我幾乎以為，找不著護照——無論多短暫——其實是一種弗洛伊德式的非意外，並且跟持其他國家護照的人比起來，這種非外在持用中華民國護照——當然，是在台灣核發的——的人身上更常見。

當然，不僅沒有台灣的護照，也沒有台灣的大使館(即便中華民國的大使館，也只在少數小國家存在)，只有「台北經濟與文化辦事處」。在世界衛生組織中沒有台灣，這在平常時期或許不要緊，但碰到2003年的非典型急性肺炎(SARS)，就顯得非常重要。此外，在奧運會上，只有一團通常非特別知名的選手代表「中華台北奧委會」參加。幸虧紐約洋基隊不是一個官方的政府組織，所以在王建民還是非常著名的運動員的那段期間，他還能被說是來自台灣。

表面上，此處的問題正是陳嘉銘在NATSA的論文中指出的：台灣被困在一個不讓它展現自由主體性的國際體系中。從台灣的角度來看，這是一種說法，但對世界真正的啟發涉及了民族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民族是一種由國家來陳述的人為的建構物，而該國家的正當性受到了其他國家的承認；民族並非是源自共同歷史與文化、自然衍生的社會單位。許多國家當然實際上都包括了多個文化與多個種族，像是美國和中國。而我們也都從這兩國以及其他許多案例中看出，民族是必須被建構的。但是台灣的情況啟示我們從更深一個層次去批判民族這個概念，即使對於護照持有者和奧運選手而言，只有悲喜劇的感覺。民族不僅是被建構出來的，它還包括其他三件事：第一，即使這個國家在自己的邊界內(或者，以台灣來說，

它的海岸線內)掌握有效的控制力，民族的建構仍然可以被全然外在的因素所阻礙。其次，這個事實會令人困擾。在今日的世界，人們想要成爲一個民族，想要有自己的國旗、政府和軍隊，還想要有自己的護照和奧運隊，就跟那些廣被承認的民族一樣。第三，這個問題誠然引發極大的民族焦慮感，卻只會造成少數的實際問題。台灣的國家(state)和家國(country)——不像民族(nation)——運作良好，日子「混」得比許多社會都高明許多。

三、從中國到世界

在2006年的研討會上，韓馬克的論文提醒，在現今既有的媒體和學術本位下，有些事情容易被遺忘：除了台灣和中華民國，這座島還有過其他的名字。大部份人都知道Formosa，但我們都忘記它還曾經被稱做琉球、自由中國、Nationalist China、和很多其他的名稱。我們也忘了，至少在某些語境下，「台灣」曾經不是指這座島本身。在1960或1970年代，在美國、日本或其他國家，當某人被稱爲「支持台灣派」，那無關乎此人對台灣的立場，而是說他贊成與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而非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打交道。在那時代，同時與兩邊交往毫無可能。事實上，從當時福爾摩沙獨立運動分子的角度來看，所謂的「支持台灣派」其實是反台灣，因爲他們所支持的政策，會強化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在這個脈絡中，台灣一詞是「中華民國」在修辭上所謂的舉隅，指中華民國政府所宣示的領土中實際控制的一個小部分。面對著當時中國大陸正進行的文化大革命，台灣這個詞也意味著中國文化保守主義。

我提到這個名稱遊戲，是因爲它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可引導我們討論台灣第三次轉型的啟發，也就是從「中國導向」到「世界

導向」，也許在當今的政權之下還會半路又回頭。大約是民國五十七年和五十八年，我首度住在台灣的時候，外國人在台北看到的世界是一個移植異地的小中國。食物都是來自中國的39個省份和地方，而非台灣，另外還有平劇⁵，以及各種標語：「消滅萬惡毛賊，實現三民主義；反攻大陸，解救同胞」。其中，最醒目的標語是在台北車站的「毋忘在莒」，儘管我們從來不懂「莒」到底是什麼或者在哪裡。媒體封鎖了所有真實的消息，特別是任何有關中國事物的新聞——周恩來的照片出現在海外發行的《時代》雜誌或《新聞周刊》時，不是整頁被撕掉、塗上黑墨，就是（對我們來說最好笑的）被蓋上匪諜的字樣。

如我在其他地方談過的，當時人類學者也用自己的方式「傾向中國」。具有中華民國國籍的人類學者，延續著日本殖民傳統和中國的民族學傳統，投身於記錄南島民族村落的風俗與物質文化；但外國人類學者，一方面因為無法進入中國大陸，另一方面也因為共產黨的革命已經把中國大陸的「中國文化」改變得面目全非，所以到台灣完全是為了研究中國。結果，政府遙想一個從來不曾存在過的中國，徒然地希望可以在反攻之後落實；而外籍人類學家，雖然鄙視這個愚蠢的政府，以為他還有任何統治中國的正當性，嘲笑反攻大陸的念頭，卻在新興、溪州或鯤鯓想像一個非常真實的中國——每一個方面都很真實，可就不是中國。史蒂芬·穆瑞和洪基隆譴責人類學家是國民黨的傀儡，或許是過謗了，因為他們大多數都恨國民黨。但是，穆瑞和洪基隆不無他們的道理。

如今，一如當時，這些當然都顯得古怪又過時。而台灣雖然苦

5 需要強調的是，平劇不僅僅是來自中國，它更是來自文革前古老的中國。

於算不上一個國家，它與世界接軌的程度，比起其他多數國家只有過之而無不及。台灣和世界有什麼連結，在此沒有必要贅述，但是台灣如何連結上世界的方式，卻可以告訴我們許多有關全球化的事情。

台灣轉向世界所提供的第一個啟發是來自奇蹟年代的經濟啟發，已經有些年代了。它告訴我們，對小國來說，停留在自身的經濟疆域之內是不可能的。眾所皆知，台灣在經濟上的致富與轉型，靠的機制是由國家主導、以出口為導向、生產消費品的工業化。它究竟是證明自由貿易好，還是證明反自由貿易好，端視我們怎麼看待這整個過程。一方面，早期進口替代政策中降低貿易壁壘的作法，以及1960年代中期轉變成促進出口，帶動了經濟快速成長的起飛，早已受到公認。若沒有貿易，台灣的經濟不可能這樣奇蹟般的方式來擴張。但同時，貿易的這番成長透過了許多財政與關稅政策的調整來管理，這樣造成的市場管制，真正的自由市場信徒會視為扭曲市場。貿易——無論透過自由、公平的市場，抑是經由管制，看你對經濟正義持何成見而定——貿易不僅是經濟成長的必要條件，也是台灣藉著各種連結從中國導向轉為世界導向的必要條件。傾向中國的意思就是自給自足，可是這種鎖國不會成功；台灣的經濟不可能局限在自己的疆域裡面而還有成長可言。

第二個啟發，就是不可能偏安在自己文化的疆界之內。當然，在過去戒嚴令、出版查禁、以及自由中國的宣傳充斥的時期，那是有可能的。但是，一旦解除審查，出版和言論自由化，並允許進口書籍雜誌後，小國的文化邊界就消失了。1997年，我與文化運動者陳其南到宜蘭探望我的學生呂欣怡，看過一個絕佳的例子。他們招待我的，是從建築看官方版的宜蘭文化史，後來呂欣怡寫成她書中的一章。宜蘭縣政府模仿19世紀福佬人的農舍，代表在當地居主的

河洛人口；圖書館則採用蘇州庭院風格，體現中華民國的影響，也可以更浮泛地說是帝制中國的仕紳文化；宜蘭歷史博物館是日本官員俱樂部重新裝潢而成，代表日本殖民的影響；一座新建的公路橋則照著現代主義建築師的想像，重現泰雅男人的弓箭和婦女的採集籃，代表的是山居原住民的歷史傳承；我還參觀了兩間政府補助的宜蘭厝，一間叫噶瑪蘭厝，完全憑猜想模仿過去宜蘭平原上噶瑪蘭族的房子，代表宜蘭平原的原住民；另一間則是北歐森林的現代風格，我猜想，代表的是全世界以及宜蘭的廣闊世界主義。

這些由文化思考者如游錫堃和陳其南等人所策劃出的設計，也許顯得有點樣板和過於刻意，但我把它們視為跡象或者外顯，所表達的是台灣進步的思考者的努力，想要避開文化民族主義和排他式文化沙文主義，當然值得頌揚。任何人想要用某種理由論證台灣民族主義，都不可能訴諸一種獨特的語言和文化。台灣的語言、食物、宗教、節慶和許多其他事物，都有其獨特的傾向和面貌，可是這些獨特性並不足以構成一種獨特的「民族文化」。我在台灣學會的福佬或閩南話，讓我可以到福建南部應付裕如；台灣的神祇（包括台灣的媽祖廟委員會），我能追溯到整個中國東南沿海區域；慶典節日則多多少少和漳州與泉州相同。事實上，幾年前我問了一個到過台灣的成都朋友，他覺得台灣怎麼樣。他說：「我非常喜歡台灣；台灣比中國還中國。」台灣真正獨特的事物源自本土南島文化，但非常可惜，在島內的文化「主流」中，只有非常微弱的影響力，另外就是來自日本殖民主義和近期從美國來的影響，可是話說回來，中國也有越來越多美國的事物了。

這裡學到的啟發並非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我個人是非常強烈地傾向另一邊的立場——或者是兩個民族可以有一個共同的文化——雖然這個提法我倒是可以安然接受。這裡的啟發是，台灣因為

環境使然，在文化上無法設立具有排他性的邊界；如果台灣想要建立起任何民族意識，這種民族意識大概必須立足於歷史給予的各種影響所組成的特殊混合物，而不是任何固有的、不變的傳統。結果呢？雖非始料所及但十分可喜：台灣的本土知識分子必須要建構一種不訴諸敵意的包容式的民族主義。由此得出的啟發是，如果民族主義的宗旨是要建立公民的忠誠度，那麼這種不具敵意的、包容式的民族主義的效果，跟許多民族主義政府——包括中國政府——所操弄的原始情感的危險、具爆炸性的訴求比起來，至少毫不遜色。

當然，這裡仍然有危險；台灣在轉變為世界導向時，這是我們可以學到的最後的啟發。危險之一是，包容式的民族主義意識型態似乎總是顯得虛弱，無法對抗中國民族主義原生而排他的主張。所有與我在中國聊過天的人，幾乎都認定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甚至沒有討論的餘地；李登輝和阿扁則都是日本人和美國人的傀儡，日本人和美國此生的大野心就是看到中國分裂，好讓他們能延續自1940年代被迫中斷的殖民壓迫；對此，中國人將欣然付出生命，以防止台灣在名義上成為獨立的國家，即便事實上台灣過去已經這樣做了61年。英語世界的媒體升高了這樣的危險，因為他們在發佈新聞時，一定不忘加上「北京認定台灣島是為一個叛離的省份」這樣的陳腔濫調。

另一項危險則是族群間的緊張對立正在表層之下蠢蠢欲動。2006年侯孝賢和其他人呼籲抗拒台灣文化的「閩南化」，可能並非危言聳聽。當綠營廣被指責在經濟和外交方面的治理失敗時，閩南化的策略當然很難抗拒。我自己也聽過三個不同黨派的原住民立法委員都提到福佬霸權的威脅。當台灣傾向中國時，這種危險無足掛齒；中國民族主義不會利用漢人內部的任何差異，而原住民很遺憾地所占人口比例太低，意義不大。對世界來說，可以學到的啟發是，

包容的政治共識必須維持下去，否則民主就會變得脆弱不堪。如今，政府既然在文化與經濟傾向上再次往中國靠攏，政治共識的包容性要如何維持，值得關注。我抱持樂觀的態度，但也不會完全不把我那些深綠朋友們的警告當回事，他們認為所謂「台灣」這回事即將瓦解。這或許又是民族焦慮感的徵狀吧。

四、從垃圾島到美麗島？

1991年夏天，正值台灣塑膠業時代的高峰，我短暫拜訪了台北縣三峽鎮附近我那熟悉的「第二個家」。數天後我人到了中國，在筆記上我寫著：

台灣是座垃圾島。我們通常認為環境問題多半是水汙染和空氣汙染，或者可能是各種開發帶來的棲息地的破壞。以上所有狀況都發生在台灣，但垃圾是最主要的問題。街道上成排的垃圾，在河川上也漂浮成排，垃圾從每個門廊和每棵樹上滿溢出來。

我不認為台灣人比(例如)中國人來得更不髒亂。舉例來說，生態環境問題(包括垃圾)的意識是存在的，甚至連犁舌尾的居民都有過示威抗議，而且1989年我在大豹溪調查問卷時，回覆我的居民也都經常提及垃圾是當地的缺點。所以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認為主要的問題純粹是數量和密度的問題。一罐冰汽水在成都都是三塊人民幣，那真是難得的享受，如果一定要喝，大多數人大概一個禮拜不會超過一罐。但是在台灣，二十塊新台幣並

沒什麼大不了，所以當天氣炎熱而你又必須在外面跑的時候，當然就會買一罐汽水。所以每平方公尺就會有更多易開罐。在台灣這個商品多樣豐富的社會中，消費商品都得包裝，用的多半是塑膠或其他相同有毒物質。以致於這些垃圾不斷加乘……

最弔詭的是，每個人都在抱怨垃圾問題。譬如說，事實上犁舌尾的居民有組織起集體行動，抗議垃圾在村庄旁持續的傾倒和堆積。他們阻擋了卡車，今年稍早也抗議遊行了好幾次，並最終阻止了垃圾公司在當地的傾倒。然而，在道地的東方社會的鄰避情結⁶之下，垃圾公司找不到任何其他地方傾倒垃圾，幾周以後，他們又開始傾倒，但這一次，就沒有任何示威抗議了……

目前情況已經好很多了，但如我們所知，台灣要從垃圾島再回復成美麗島恐怕還有一段路要走。最近一次我造訪三峽附近的村庄時，我的寄宿家庭拿出一本我的書《犁舌尾》，翻找書中1970年代初期的舊照片懷舊，拿給和我同行拜訪台灣的美國籍同事夫婦看。我們翻到一張照片，山坡上有幾片種稻的梯田，沿著小河蜿蜒著，樹木和紅磚屋座落在河流的上方。“li kua: hit gu kat sui...a jima pi: kat bai!”⁷這似乎是每個人的感受，至少是對鄉村景觀而言——再也不存在綠色田野間的紅磚厝建築，事實上連田野都很少見了，更多的是毫無規劃、不搭調到刺眼的建築物所構成的社區；再也沒有水牛從暮色中漫步回家的鄉村牧歌景色；再也沒有蒼翠茂林裡的泥土小

6 鄰避情結，是NIMBY的廣用翻譯，而NIMBY則是Not in my backyard(不要在我家後院)的縮寫。

7 閩南話：「你看那時候美多了，現在變得較醜。」

徑，連結山脊兩側的小鎮。在都市方面，大城市的空氣汙染相當糟糕——雖然我總是用盲目愛台灣的方式，指出台北的汙染與武漢或成都根本不能相比。舊台北車站前取代「毋忘在莒」標語的噪音測量器已經消失好些年了，而噪音的程度也的確有改善。但地方太小，人太多、汽機車也太多；台灣沒有那個城市，足以作為控制汙染的模範。

儘管如此，最嚴重糟蹋環境的時代的確已經過去，而從這項轉變如何發生，我們來看看世界能從台灣學到的第四類啟發。

首先一個啟發，魏樂博教授在他最近兩本書中清楚倡議，那就是環境意識和政治民主相輔相成。這不只是常見的老調重彈，說民主制度確實遏止了獨裁、壓迫性政府、及其工業部門或裙帶企業對環境的破壞掠奪，雖然中國晚近的情況很明顯地從反面證明了這一點。重點在於，如魏樂博所指出的，環保運動可以促成草根性的政治組織，並且由此促成整個社會的民主化與政治參與。在高雄後勁首次抗爭運動中，非常清楚地展現環保抗爭和政治反對派的發展如何可能攜手共進，呂欣怡已有紀錄。

第二個啟發是環保抗爭和運動未必專屬於是菁英，儘管環保主義本身也許是一種菁英的意識型態。理查·懷特在他一篇已成經典、討論華盛頓州的〈你是環保人士，還是工作謀生的人？〉⁸一文中指出過，生活在一個環境中的人，會關心該環境的保存，以便繼續在其中生活；不論是美國西北海岸區森林的伐木工、南台灣山區的魯凱獵人、還是高雄骯髒的工業郊區的藍領工人，這一原則都適用。南部抗議中油五輕廠的產業工人、北部阻止垃圾車的村民、或者是

8 Richard White, "Are you an Environmentalist, or do you Work for a Living", 收錄在 *Work and Nature* (1994) 一書中。

集結起來阻止隘寮壩堰興建的原住民聯盟，他們全都是關心家園的當地居民。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這些抗爭行動都冒著不小的風險（雖然和早先10年相比，風險還是小得多了），而這些抗爭都是為了家園。

第三個啟發是環保運動和政府有時可能是對立的，但有時可能結盟。當政府和企業成為發展的火車頭時，後勁的抗爭者和其他許多人都是在政府當局的對立面，但台灣目前正瘋狂著迷於發展地方特色的產業或者景觀，讓外地人來吃、來照相、來買回去當做到此一遊或送人的裝飾禮品，以資提振經濟，那麼這些地方必須要看起來乾淨體面。當我回到鶯歌時，我感到非常驚訝，因為當地已經幾乎沒有燒窯了，所以也不再有意煙囪，取而代之的是——理所當然——漂亮的陶瓷博物館，以及一條完全不老的「老街」，禁止車輛通行，鋪著精美的假鵝卵石，充滿各種有趣的商品，例如我的朋友馬騰嶽帶我去那裏時，送給我一個陶瓷製的鳥鳴笛。在地文化運動對我上述提及的包容性認同的形成，是相當重要的，它也成為環保人士的盟友。可是你去那裡——不論「那」是哪裡——的時候可別開車。

這個議題將我們帶回阿扁身上。如果他最大的成就是當選總統（指第一次當選），那麼他第二項重大成就——而且我猜想這是他當初為何會當選的主因——就是他推行垃圾不落地的政策。前美國眾議院議長帝普·奧尼爾的名言：「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性的」，也許有點誇張，但在環保問題上，台灣證明了這句話幾乎是永恆的真理。